



# 文化研究三題議

俞吾金

(復旦大學 哲學學院，上海，200433)

**[摘要]**文化研究要向縱深發展，研究者就應該確立自覺的反思意識，對自己所運用的基本概念的含義和研究方法的界限作出批評性的反思。比如，大家熟悉的“世界文化”這個用語，它實際上祇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在現實生活中，世界文化是以多樣性、多模式的方式呈現出來的。儘管不同模式或類型的文化之間可能存在某些共性，但並不存在作為一個統一的、共同的研究對象的“世界文化”，也不存在超越任何個別類型或具體模式的普遍性的文化對象。又如，“主流文化”也是一個不確切的用語，它不應該是複數，而應該是單數，以便與“支流文化”保持“一”與“多”的對應關係。主流文化是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地而異的。不能脫離具體的文化共同體及其他具體的歷史發展階段，抽象地談論所謂“主流文化”，這樣的主流文化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與此同時，文化研究的方法也應該由思辨的方法推進到分析的方法，而分析的方法又蘊涵着比較的方法。在當代文化研究中，比較方法乃是無法回避的、實質性的研究方法。

**[關鍵詞]**世界文化 主流文化 思辨的方法 分析的方法 比較的方法

**[作者簡介]**俞吾金(1948— )，男，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人，哲學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外國哲學、國外馬克思主義和當代中國文化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從康德到馬克思》、《重新理解馬克思》、《問題域的轉換》、《實踐與自由》、《文化密碼破譯》、《俞吾金集》等。

**Title:** Three Issues on Cultural Studies

**Abstract:** For promoting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ers should establish self-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to mak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ir use of basic concept implication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For instance, the term "world culture" which is known by everyone, is actually an abstract conception; it does not exist in reality.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are diversified and multi-pattern.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qualities in comm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patterns and types of cultures, there is neither a unified or mutual object of study for "world culture", nor does a general cultural object beyond any particular types or concrete pattern exists. Another example is the term "mainstream of culture" which is an imprecise term and should not be in plural form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one" and "mor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in "mainstream culture" and "tributary cultures" respectively. Mainstream culture varies from person to person, from time to time and from region to region. "Mainstream culture" cannot be discussed discretely and separated from cultural communities and other solid stages of history development since this kind of mainstream culture does not exist. Meanwhile, the research method for cultural studies should be driven from "speculative method" to "analytic approach" with the latter contains comparative method.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omparative method is an unavoidable and substantive research method.

**Keywords:** world culture, mainstream culture, speculative method, analytic approach, comparative method

**Author:** Yu Wujin is a PhD in philosophy. He is currently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in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at Fudan University.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studies of Western philosophy, Marxism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哲學研究的深入，是與研究者們所確立的自覺的反思意識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正是這種反思意識，促使學者們對自己的研究思路，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的含義，甚至包括提出問題的方式，作出批判性的考察和嚴格的界定，從而引導整個研究向縱深發展。哲學研究是如此，文化研究也是如此。而學術界在展開對所關注的文化問題的探討之前，極有必要對未加反思就已接納的兩個基本概念——“世界文化”（world culture）和“主流文化”（mainstreams of culture）——的含義，以及整個文化研究的方法，作出批判性的省思。

### 議題一：存在着“世界文化”這個研究對象嗎？

“世界文化”這個概念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大眾媒體中一直被廣泛使用，並用這個概念指涉人們心目中的某個共同的對象。然而，人們又總是隱約地感覺到，這一指涉的內涵是模糊的，缺乏應有的確定性和明晰性。因為，世界上有“世界文化”這個概念，卻並沒有這個概念所指稱的對象。換言之，這個概念所指涉的對象並不存在。這就像英美分析哲學家們所討論的“金山”、“飛馬”、“魔鬼”等觀念；也像中國古代傳說中出現的“龍”、“麒麟”、“魚美人”等觀念。所有這些觀念，都是人類想象力的產物。作為觀念或概念，它們在人類的記憶中積澱下來，代代相傳，但在實際生活中卻找不到這類觀念或概念所指稱的對象。要言之，它們祇是以概念或觀念的方式存在着，但在實際生活中並沒有對應物。

同樣地，當一個人把“世界文化”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時，他立即就會發現一個令他驚訝的事實，即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世界文化”，它不過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罷了。因為，世界上並不存在一般的、共同的文化，文化祇存在於個別的或具體的模式中。換言之，任何文化都不可能以一般的、無模式或無類型的方式存在。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在《小邏輯》中就曾批評過那種試圖把一般與個別割裂開來的錯誤觀念：“例如，在日常生活裏，怎麼會有人祇是要水果，而不要櫻桃、梨和葡萄，因為它們祇是櫻桃、梨和葡萄，而不是水果。”<sup>①</sup>在《哲學史講演錄》中，黑格爾又批評了“一個患病的學究”所持有的錯誤的思維方法：“醫生勸他吃水果，於是有人把櫻桃或杏子或葡萄放在他前面，但他由於抽象理智的學究氣，卻不伸手去拿，因為擺在他面前的，祇是一個一個的櫻桃、杏子或葡萄，而不是水果。”<sup>②</sup>“水果”作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稱謂，它本身不過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在實際生活中並不存在“水果”這個對象。它作為概念，祇能存在於櫻桃、杏子或葡萄等各種具體的果實中。如果進一步對黑格爾的話加以分析，立即就會發現，他這裏談到的“櫻桃、杏子或葡萄”也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個別事物，而仍然不過是普遍的、抽象的概念。因為，櫻桃、杏子或葡萄，也是劃分為具體的不同的種類的。根本不可能存在一般的、超越任何種類之上的櫻桃、杏子或葡萄。以我們比較熟悉的“蘋果”為例，它就擁有許多不同的種類，如國光、金冠、紅玉、富士等等。由此可見，“蘋果”這個術語在實際生活中也是找不到對

① [德]黑格爾：《小邏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賀麟譯，第55頁。

② [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賀麟、王太慶譯，第1卷，第23頁。

應物的，能找到對應物的祇可能是“國光蘋果”、“金冠蘋果”、“紅玉蘋果”、“富士蘋果”等等。<sup>①</sup>其實，仔細地推敲下去，就會發現，甚至連“國光蘋果”、“金冠蘋果”、“紅玉蘋果”、“富士蘋果”這些術語也已經被抽象化、普遍化了。唯有通過指示代詞與這些概念的結合，如“這個國光蘋果”、“那個金冠蘋果”、“這些紅玉蘋果”、“那些富士蘋果”，纔會在實際生活中找到對應物。然而，按照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的分析，就連“這一個”這樣的代詞也會在語言的使用中被普遍化、抽象化。所以，在實際生活中，祇有當人們指着實物說出相應的概念時，這些概念纔會真正對應於實際生活中的存在物，否則，它們就會脫離被指涉的對象，蛻變成抽象的、無意義的符號。這也正是黑格爾提倡“具體的普遍性”的緣故。

由此可見，我們誤以為存在的“世界文化”，也不過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已。儘管在人們的言談中使用了這個概念，卻並沒有這個概念所指涉的對象。在實際生活中，真實存在的是下面這些文化類型：例如，從地域上劃分的亞洲文化、北美洲文化、南美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歐洲文化、非洲文化、大洋洲文化等；從宗教上劃分的佛教文化、天主教文化、基督教新教文化、東正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道教文化等；從國家角度劃分的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美國文化、埃及文化、墨西哥文化等。

總之，世界上的文化是以多樣性、多模式的方式呈現出來的。儘管不同模式或類型的文化之間可能存在某些共性，但並不存在作為一個統一的、共同的研究對象的“世界文化”，也不存在超越任何個別類型或具體模式的普遍性的文化對象。事實上，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一文中，列寧（В. И. Ленин，1870—1924）早已明確地論述了一般與個別之間的辯證關係。他在《哲學筆記》中這樣寫道：“這就是說，對立面（個別與一般相對立）是同一的，個別一定與一般相連而存在。一般祇能在個別中存在，祇有通過個別而存在。任何個別（不論怎樣）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個別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sup>②</sup>顯然，祇有從理論上先行地認識到這一點，纔不會在探討世界文化這個抽象觀念時陷入思想上的誤區。

## 議題二：“主流文化”究竟是單數還是複數？

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細節是，人們在談論“主流文化”時，使用的是複數形式“mainstreams of culture”。然而，與我們上面討論的文化類型或模式的多樣性相反，在我看來，主流文化不應該以複數形式，而應該以單數形式顯現出來，即不應是“mainstreams”，而應是“mainstream”。

毋庸諱言，“主流文化”這個術語中的“主流”，源於人們對自然界中溪流的經驗性的觀察。然而，按照常識，溪流中的水在流動時可能形成諸多不同的支流。也就是說，支流通常是以複數的形式顯現出來的，但主流卻應該是唯一的，即處於單數的狀態下的。換言之，任何溪流都不可能有兩三個，甚至更多的主流。事實上，“主流”之“主”是相對於“支流”之“支”來說的。它們的關係應該是“一”與“多”的關係，而不是“多”與“多”的關係。否則，“主流”之“主”所擁有的單一性和主導性的含義便蕩然無存了。

當人們把對自然界溪流中水的運動的觀察結果作為比喻移用到文化研究中去時，就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情況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如果說，自然界中的溪流是感性的、可被觀察

<sup>①</sup> 在實際生活中，經常聽到有人說：“在一般情況下……”其實，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般情況”。正如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一般的房子”、“一般的人”、“一般的國家”、“一般的條件”一樣，世界上也不可能存在“一般情況”。任何情況都是個別的，而一般性只能通過個別性而顯現出來。

<sup>②</sup> [俄]列寧：《哲學筆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409頁。

到的現象，那麼，文化運動中的主流和支流卻像空氣一樣，是看不見摸不着的，需要人們通過對文化流轉物的觀察、對文化符號含義的領悟和對文化深層結構的反思來加以把握。

然而，任何人對文化的探索都是離不開自己在探索之前就已擁有的“理論視角”（theoretical perspective）的。也就是說，當人們從不同的理論視角看出去時，必定會對文化中的“主流”究竟是什麼作出迥然不同的判斷。也就是說，世界上並不存在某個大家共同認可的所謂“主流文化”，主流文化是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地而異的。這就深刻地啓示人們，不能脫離具體的文化共同體及其他具體的歷史發展階段，抽象地談論所謂“主流文化”，這樣的主流文化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見，人們不應該脫開具體的語境，隨意地使用“主流文化”這樣抽象的、模糊的術語來表達自己的文化見解，而應該在明確的文化語境中規定它的確切的含義。

### 議題三：“思辨的方法”還是“分析的方法”？

在文化研究上，中國學者普遍心儀的仍然是“思辨的方法”（speculative method）。這種方法的特徵是：喜歡從宏觀上、總體上、歷史演化上侃侃而談，但對文化的內在結構、重要的局部、基本概念的含義卻缺乏深入細緻的瞭解，因而由思辨的方法引申出來的研究結論總是給人以空泛的、粗疏的、模糊的印象。顯然，如果文化研究總是停留在這種思辨的方法上，是很難向縱深發展的。

儘管宏觀上的、總體上的眼光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對於當代中國學者來說，更應該從目前英美國家佔主導地位的分析哲學所推崇的分析方法中獲得自己的靈感。假定某人研究“青年”問題，但如果他對“青年”這個概念所指涉的對象的年齡範圍並沒有一個分析性的限定的話，那麼，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的邊界就始終是含糊不清的。同樣地，假定某人研究“現代中國文學”，但如果他對“現代”這個術語所指涉的歷史時段缺乏分析性的限定的話，那麼他關於現代中國文學的言說就不可能提供出真正可靠的、確定的知識。同樣地，當人們喋喋不休地談論“文化”概念時，他們有沒有想到，這個概念有三百多種不同的定義，而他們卻沒有對自己正在談論的“文化”概念的含義作出分析性的、明晰的界定。毋庸諱言，如果這樣的界定是缺失的，那麼，在他們那裏，“文化”概念的含義就始終處於滑動的、漂浮不定的狀態下。顯然，這樣的言說祇能是遊談無根的，也是不可能在文化研究中做出實質性的貢獻的。

德國哲學家康德（I. Kant, 1724—1804）曾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先天綜合判斷何以可能？”的總問題。儘管康德強調，人類的目的是追求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綜合知識，但這樣的綜合知識正是以對概念的細緻的分析為前提的。例如，當人們談論中國傳統文化時，就必須對“心”、“性”、“天”、“禮”、“道”、“器”、“義”、“仁”、“智”、“信”、“中庸”等基本概念在不同的哲學家那裏的含義作出細緻的分析和明確的界定。事實上，祇要中國學者不認同這種分析的方法在文化研究中的基礎性、普適性和有效性，仍然停留在含混的、籠統的思辨的方法上，中國的文化研究就很難與國際學術界展開實質性的、有效的對話。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分析的方法必定蘊涵着“比較的方法”（comparative method），因為比較本身就是分析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有趣的是，人們對比較的方法的理解和解釋常常流於形式，以為哪部著作或哪篇論文中提到了“比較”這個術語，就是在進行比較研究了。然而在我看來，比較的方法具有以下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顯性的比較”（dominant comparison），即作者明確地告訴讀者，自己正在文本中使用比較的方法；另一種則是“隱

性的比較”（recessive comparison），即儘管作者沒有表示自己正在使用比較方法，甚至文本中也沒有出現“比較”這個用語，但實際上他仍然是在使用比較的方法。事實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從事文化研究，每個研究者都至少會熟悉一至兩種類型以上的文化。因此，當他從自己本土的文化視野出發去理解、解釋或評論其他類型的文化時，實際上已經在進行比較了，祇不過他自己沒有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而已。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研究中，比較的方法不再是可有可無的方法，或偶爾採用的方法，而是具有實質意義的、無法回避的方法。

[編者註：該文係作者承擔的中國教育部“985工程”第三期整體推進人文學科研究重大項目“後現代視域中的馬克思理論”（2011RWXKZD011）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實踐唯物主義：重構馬克思哲學體系的嘗試”（13JJD720004）的階段性成果。]

## 《南國學術》簡介

《南國學術》是由澳門大學出版、社科學院與澳門研究中心承辦，以“大人文、跨學科、超界域”為發稿理念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理論期刊，每三個月推出一期。在文章側重上，既探討全球問題、區域問題，也探討中國問題；在以全球視角看東方和中國的同時，還以東方視角關注世界問題。主要欄目有：

1. “名家面對面”。對話性欄目。從世界、亞洲、中國三個維度對所熟悉的學科或相關學科存在的問題和解決之道暢所欲言。提問者與學術名家不是簡單的一問一答，而是就雙方所感興趣的學術話題進行交流和探討；觀點可以相同或不同，甚至可以批評對方的觀點。目的在於，通過對話這種形式，做成一篇對話體的學術文章。
2. “前沿聚焦”。跨學科性欄目。以精闢的文字、敏銳的視角，對世界、亞洲、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熱點問題、前沿問題發表一得之見，展開深度討論。在形式上，注重以專題性筆談和綜合性論文相結合。
3. “時代問題論爭”。跨學科性欄目。針對當代一些重大學術問題，通過學者與學者間的對話、批評者與被批評者間的交鋒，在活躍學術氣氛的同時，使讀者對一些相關問題產生興趣、開闊視野。在形式上，注重以專題性筆談和綜合性論文相結合。
4. “東西文明對話”。跨學科性欄目。以刊發海內外學者對東西方文化、文明中的前沿問題的研究心得或最新成果為紐帶，搭建起中外學術交流、對話的橋樑，實現海內外學術研究成果的合作與共享。在形式上，以專題性筆談和綜合性論文相結合。
5. “思想者茶座”。綜合性欄目。對世界、亞洲、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基礎理論問題進行正本清源的梳理和闡釋，以期探索新領域，發掘新資料，建構新體系。在形式上，以綜合性論文為主。
6. “大家講演錄”。實錄性欄目。刊發受邀到各大學、各學術機構作學術講演的知名學者的講演稿。儘量保持講演人的原汁原味，使讀者感受當時的氣氛。
7. “獨家評論”。書評性欄目。在學理層面、學術史意義上對所評論的著作作出合理定位，指出它的進步與不足，為讀者更深刻地理解某一著作提供幫助。不“捧”不“罵”，言之有物。
8. “域外傳真”。綜述性欄目。包括專題研究綜述、重要學術研討會綜述、對國外學術期刊專欄文章的評述等。通過“述”與“評”相結合的形式，定期向中國學術界傳遞域外的最新學術動向、學術思潮、學術流派，促使中國學者與海外學者在學術研究上保持同步並有效互動。文章追求“即時”與“速遞”。